

张锡勤 著

# 儒学

在中国近代的命运



人民出版社

张锡勤 著

# 儒学

在中国近代的命运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钟金铃

封面设计:李欣欣

版式设计:陈 岩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学在中国近代的命运/张锡勤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

ISBN 978-7-01-009518-9

I. ①儒… II. ①张… III. ①儒家-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5139 号

## 儒学在中国近代的命运

RUXUE ZAI ZHONGGUO JINDAI DE MINGYUN

张锡勤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75

字数:25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9518-9 定价:3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目 录

|                                 |     |
|---------------------------------|-----|
| 绪 言 .....                       | 1   |
| 第一章 清代(鸦片战争前):儒学的内讧与嬗变 .....    | 10  |
| 一、程朱理学对陆王心学的攻击 .....            | 10  |
| 二、汉学与宋学之争 .....                 | 17  |
| 三、今文经学和“以经论政”风气的兴起 .....        | 28  |
| 四、诸子学受到关注 .....                 | 34  |
| 第二章 太平天国时期:反孔反儒的狂飙 .....        | 40  |
| 一、洪秀全对孔子和儒学态度的变化 .....          | 40  |
| 二、反孔反儒的狂飙 .....                 | 44  |
| 三、太平天国对孔子和儒学政策的调整 .....         | 48  |
| 四、儒学在太平天国的实际地位与影响 .....         | 53  |
| 五、汪士铎对儒学的猛烈抨击及其以法代儒的主张 .....    | 57  |
| 六、文化危机与制度危机的信号 .....            | 65  |
| 第三章 洋务运动时期:儒学的实际地位与影响开始削弱 ..... | 68  |
| 一、宋学(理学)的复兴与宋学面对“变局”的无能 .....   | 68  |
| 二、曾国藩对传统儒学的变通与背离 .....          | 75  |
| 三、洋务派对传统儒学的背离 .....             | 81  |
| 四、早期维新派对传统儒学的进一步背离 .....        | 85  |
| 五、“西学中源”说对儒学的不利影响 .....         | 93  |
| 六、西学、西教对儒学的冲击 .....             | 96  |
| 第四章 戊戌维新时期:儒学受到严重冲击 .....       | 102 |

|                                                  |            |
|--------------------------------------------------|------------|
| 一、戊戌维新时期中国思想领域的新变化 .....                         | 103        |
| 二、对儒经、儒学的正面攻击 .....                              | 108        |
| 三、论孔教“变质”，呼吁“孔教复原” .....                         | 113        |
| 四、对后儒之学的猛烈抨击 .....                               | 117        |
| 五、对儒家经典的质疑、贬低 .....                              | 123        |
| 六、康有为等人对儒学的改造之一：以儒学为外衣包装西学 .....                 | 127        |
| 七、康有为等人对儒学的改造之二：神化孔子，使儒学宗教化 .....                | 133        |
| 八、一次不成功的改造 .....                                 | 137        |
| 九、佛学热对儒学的负面影响 .....                              | 141        |
| 十、“中体西用”说：传统儒学无力的防守 .....                        | 144        |
| <b>第五章 20 世纪前十年：儒学的地位严重动摇 .....</b>              | <b>149</b> |
| 一、20 世纪前十年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新变化 .....                    | 150        |
| 二、20 世纪前十年中国思想领域的新气象 .....                       | 153        |
| 三、20 世纪前十年中国社会习俗的革新 .....                        | 156        |
| 四、梁启超的“破坏主义”与文化领域“革命”的兴起 .....                   | 161        |
| 五、梁启超对“孔教复原”的否定，孔子开始遭到公开批评 .....                 | 168        |
| 六、批儒批孔潮流的兴起 .....                                | 172        |
| 七、“国粹派”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 .....                           | 183        |
| 八、废科举、兴学堂、推翻帝制：对传统儒学致命的打击 .....                  | 192        |
| 九、晚清儒学阵营的衰落景象 .....                              | 203        |
| <b>第六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学的主流地位、统治地位最终<br/>结束 .....</b> | <b>210</b> |
| 一、民国初年喧嚣一时的尊孔复古逆流及其所遇到的抵制 .....                  | 211        |
|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孔子和儒学遭到更激烈的批判 .....                  | 225        |
| 三、论批儒批孔是捍卫民主共和、反对帝制复辟的需要 .....                   | 231        |
| 四、论批儒批孔是批判封建旧道德的需要 .....                         | 234        |
| 五、论反孔是反对文化专制的需要 .....                            | 236        |
| 六、论反孔是改造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需要 .....                   | 239        |

|                            |     |
|----------------------------|-----|
| 七、白话文普及,儒学传承遇到更严重的困难 ..... | 241 |
| 八、儒学独尊的时代终结 .....          | 244 |
| 结 语 .....                  | 246 |
| 参考文献 .....                 | 255 |
| 后 记 .....                  | 260 |

# 绪 言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孔子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代表、中国古代社会的最高权威,是古代中国人世代宗仰的“大成至圣先师”。儒学和孔子对中国古代社会至深至广的影响是其他任何学派、任何人所不能比拟的。可是,到近代(特别是 20 世纪的头十多年),儒学和孔子却连连遭到攻击、批判,其地位、影响不断削弱。在五四之后,儒学的主流地位、统治地位显然是结束了。

对于这一历史结局,有人将其归结为 19 世纪末以来一批改革者、新学家们(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持续批判的结果,似乎在中国独尊了两千余年的儒学是被一批新学家为数并不很多的批判文章批倒的。这种认识无疑失之简单,是不准确的。显然,儒学在近代不断削弱、衰微,最终失去主流、统治地位,被边缘化,乃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社会转型,文化革新、文化转型的必然结果。它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展开、古代社会的解体基本同步,其历史必然性是不言而喻的。

—

1840 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在此之后,中国所面临的乃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民族危机

与社会危机不断深化,迫使几代中国人不得不认真思考中国应何去何从这一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几次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使有识之士认识到,面对数千年未有的新形势、新局面,传统儒家的一套大经大法、治平之道已不足以应变。要想有效地应对变局,就必须对儒家传统的大经大法、治平之道作变通,其方向、途径则是“师夷”,即学习西方。这便是所谓以变应变。正是基于这一认识,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发动了洋务运动。那时,主张以变应变的洋务派虽不曾怀疑、否定儒学的神圣,可是,他们既然主张以变应变,不完全按照传统儒家的大经大法治国,在治国之道上对传统儒学有所偏离,这就削弱了儒学在政治上的影响。事实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有识之士已不再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神话。就儒学而言,它所关注的重点是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而在汉武“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在中国社会的最大影响在于它乃是执政者治理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一旦传统儒学面对千古变局显得无能为力,执政者不再完全按照传统儒学的理路治国,它的实际影响自然要削弱。

洋务派治国方略调整的直接结果是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资产阶级。这种新的经济、政治力量,既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产物,它又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发展。于是,在中国思想领域又出现了新的变革呼声。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早期维新派思想家进而主张在政治、经济制度层面学习西方,进行更深入的变革。在政治上,他们呼吁效法西方,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的制度。为此,他们对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作了程度不同的批评、指责。在经济上,他们否定传统的重农抑商、崇本抑末的国策,呼吁变以农立国的中国为以工商立国、以工立国的中国。视君主专制为神圣,极力予以维护;视农业为国本,极力予以培植;这乃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本国策,同时也是传统儒家的基本主张,是他们治理国家的根本理念。早期维新派思想家呼吁并力图实现君民共主、工商立国,这对传统儒家的治国理念而言,就不只是偏离而是背离。可是,这种背离却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近代化进程的需要和必然。它说明,中国若要实现近代化,就必须对传统儒学有所背离。

儒学的地位、影响随着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展开而不断削弱,其轨迹是

十分清楚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缓慢发展,随着东渐的西学影响越来越大,中国新兴社会势力的代言人登上政治舞台,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逼迫下,强烈的变革呼声迅速转化为社会变革的实践。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进程大大加快,儒学衰微的进程也随之加速。这一坠落过程,速度是惊人的。

正规说来,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全面启动始于戊戌维新。康有为等人的口号是“大变”、“全变”,断然反对洋务派的枝节皮毛之变(虽然他们并未曾做到)。当维新派试图在中国实现全面的资本主义变革后,他们自然会感到传统儒学的一套大经大法、基本理路与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变革是冲突的。为推行变革,不能不触动儒学。此前,洋务派对传统儒学尚只是偏离,早期维新派虽有背离但并未正面触动儒学。而到戊戌时期,人们则开始对儒学作批判。

在戊戌时期,少数人已公开谴责“六经五子”(严复),呼吁国人不作“六经奴婢”(何启、胡礼垣)。康有为等人出于对中国国情的考虑虽仍打尊孔的旗号,但他们在恢复“孔学之真”的名义下对所谓“后儒之学”作了尖锐猛烈的批判。他们所指称的“后儒”,范围相当之大,从曾子、荀子起直到倭仁、曾国藩。这中间的大儒、名儒无不遭到他们的攻击。既然从曾子或荀子起,一代代后儒均是败坏“真孔学”的罪人,被革出儒家教门,这样,儒家的队伍就溃不成军、不成为一家了。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攻击的矛头又指向儒家经典。康有为等人不仅宣称古文经为“新学伪经”,是一堆废纸,又对一些今文经有所非议、讥评和贬低。其矛头甚至指向《论语》,竟然宣称《论语》“谬陋粗略”,没有多大价值。这样一来,儒家的府库也被他们掏空。康有为等人宣称民主、自由、平等、民权、进化、变革……才是孔学真义,这种“诠释”实际上是以孔学包装西学,其实际效果只能是以西学取代孔学。概言之,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开始出现历史性的新变化,随着中国社会变革的展开,从戊戌时期起,儒学开始遭到严重冲击。

一旦儒学、儒经遭到攻击,孔子本人被攻击就难以避免了。于是,从20世纪头两年起,孔子遭到“点名批判”(有时连带孟子),对儒学的批判又大大地提升了一级。孔子遭点名批判之日,正是革命风潮兴起之时。革命风

潮的兴起,“建立民国”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近代的社会变革进一步深入。既然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最高政治权威皇帝、两千年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帝制成为革命对象,那么维护君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代表孔子势必连带成为革命对象。在 20 世纪的前十年,不仅革命派成员批儒批孔,连一些政治立场比较温和的人士,也投入对儒学的批判。

大致说来,在 20 世纪的前十年,亦即晚清的最后十年,儒学的传统地位严重动摇。在这十年中,儒学的地位所以严重动摇,固然与这一时期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对它的批判特别是对孔子也作点名批判有关,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这一时期儒学的地位所以严重动摇,主要原因是由于制度层面发生了变革。

经由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大事变,面对革命风潮勃兴的严峻形势,迫于内外压力,清朝政府为了以变求生,从 1901 年起开始推行“新政”。清政府推行新政,主观意图固然是为了自救,但客观上却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它使中国的政治、经济都产生了一些新变化。新政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缓慢发展,这就无声无息地加速了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进程。而一些政治、文化教育方面的新举措,则对中国近代社会造成明显的直接影响。1905 年废除科举,就使儒学独尊失去了制度的保障、支撑和依托。从此,中国广大士子不再需要通过熟读儒家经书进入仕途。一旦这根指挥棒、这块敲门砖失效,儒学就再也难以保证独尊的地位。而给儒学带来更大危机的则是新式学堂在中国的普及。随着新式学堂的迅速普及,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虽然,在当时“读经”仍是学堂的一门主课,但学堂所学的毕竟主要是各科“新学”。儒学不同于宗教,它不是靠一批神职人员,而是靠诵习儒经的知识分子来传承的。一旦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转型,儒学的传承就出现了后续无人的严重问题。待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儒学就又失去了政治上最大、最有力的庇护者和尊奉者。辛亥革命后,传统的祀孔典礼中断,学堂废止了读经,说明儒学的传统地位已近终结。民国初年的尊孔潮,看上去似乎气势汹汹,其实它正反映了儒学的传统地位已近终结。若不是儒学的传统地位已近终结,那些尊孔者们是不会如此悲愤、激动,倾其全力反复抗争的。这股尊孔潮虽有强大的政治靠山,但他们所提出的种种要求、主张均未

实现。这就进一步证明,儒学业已丧失的地位是难以恢复的。

自然,儒学传统地位的终结,鲜明的历史性标志、界碑是五四。不过我们必须看到,正是由于此前数十年(特别是20世纪前十年)儒学不断被削弱、遭攻击,才会有五四“打倒孔家店”的“战果”。对儒学传统地位的丧失而言,五四猛烈的批儒批孔只是最后的一斧。

## 二

儒学在近代不断衰微,又同西学东渐有直接关系,它同西学东渐不断深化的进程大体上也是同步的。与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相比,东渐的西学自然是一种异质文化。西学与中学之间不仅存在民族差,而且存在明显的时代差。就历史发展阶段而言,西学较之那时的中学,总体上具有不可否认的先进性。因此,西学的传入,势必对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严峻的挑战。太平天国领导人以基督教为外衣发动农民战争,并一度以尊崇上帝的名义在中国南方掀起一阵反孔反儒的狂飙便证明了这一点。西方教会办的《万国公报》陆续发表一批批评儒学、贬低孔子的文章,也证明了这一点。而西学东渐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更大的挑战则是,西学与中学的时代差很快就吸引中国士人仰慕西学,向西方寻找真理,思想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

20世纪20年代,作为当事人、亲历者的梁启超曾说:

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于是以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相结合,别树一派,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sup>①</sup>

---

<sup>①</sup>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2页。

这种日益强烈的“对外求索之欲”和“对内厌弃之情”，势必深深影响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走向，改变中国近代的文化格局。

西学东渐首先是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日益强烈的“对外求索”的热情。近代中国人对外求索，由“师夷之长技”进而主张“采西学”。而对西学的学习则由制造学到自然科学，再到政法、哲理，可谓步步深入。在甲午之前，了解西学的尚只是极少数人。而甲午之后，特别是20世纪初，每年都有数千名青年学子赴日留学，在日留学生累计多达数万人。这样，在20世纪初就形成了一支受过新式教育、接受了西学的新型知识分子队伍。于是，西学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影响越来越大。那时，不仅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近代西方的基本观念迅速被国人认同，而且西方近代以来的各种社会政治学说也越来越被中国知识分子所了解，为国人所接受。一时间，青年知识分子心醉欧风，视西方近代的启蒙思想、政治学说为拯救中国的唯一灵丹妙药，求之唯恐不速。在著名的《革命军》中，邹容曾激情满怀地写了这么一段文字：

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旂，以招展于我神州土。<sup>①</sup>

这番呼吁，大体反映了那时不少青年知识分子的心声。既然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普遍认同、接受西学，认定只有西方“诸大哲之微言大义”才能使中国“起死回生”，观念的变革就不可避免了。而观念一旦变革，对儒学乃至对孔子作批判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的自觉行为。

“对外求索之欲”既已发展到心醉欧风的地步，那么，“对内厌弃之情”势必与日俱增、日趋强烈。所以如此，从根本处说是由中西文化的时代差所决定的。那时，中国知识分子所作的文化选择，虽表现为在中学与西学之间

---

<sup>①</sup> 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653页。

作选择,实则是在古代文化与近代文化之间作取舍。从历史进步的角度看,这种选择取舍在当时无疑是正确、合理的。吴虞曾有诗云:“勤探卢孟理,始觉丘轲轻。”<sup>①</sup>在20世纪初的历史环境下,当中国的社会变革正在深入进行之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了解了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学说之后,崇“卢孟”而轻“丘轲”乃是必然之势。这种“对内厌弃”,始初是表现为对那时的官方哲学亦即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流行儒学——程朱理学的厌弃,既而则扩大为对传统儒学的厌弃,很快又发展为对孔子本人的厌弃。到20世纪初,有人竟认为孔子乃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祸本”,将批孔视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社会进步的下手处。

这种“对外求索”、“对内厌弃”的情绪,直接引发了变革者们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革新的要求。大致说来,自“采西学”的口号提出后,即已萌生文化革新的意向。而自梁启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提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史界革命”、“道德革命”……的口号之后,文化革新就成为一次有纲领、有宗旨,落到实处,且受到不少变革者们支持、拥护的思想和文化运动。五四时的文学革命与道德革命,以及对孔子与儒学的批判、对鬼神迷信的揭露、呼吁国民性改造等等,正是这场发端于19世纪末的文化革新的延续,是这场文化革新的高潮。由于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在两千年儒学独尊的大环境下,中国传统文化各门类所贯穿、渗透,所阐释、宣扬的自然是儒学的精神、宗旨和主张。文化革新一旦全面展开,各门类的旧文化一旦成为“革命”对象,那么,儒学自然会遭到全方位的广泛冲击。在20世纪的头十年,儒学急剧衰微,统治地位严重动摇,与这一大环境也有直接关系。

这场文化革新对儒学冲击最大也最直接的是“道德革命”。中国近代的道德革命矛头始终直指三纲。从戊戌到五四,二十多年间一批新学家对三纲和由三纲派生的忠、孝、节三德展开了持续而猛烈的抨击和严厉谴责。他们先后指出,三纲乃是君主为了“钳制天下”而制造的“钳制之具”,三纲所维护的是不平等的等级秩序,而由三纲所派生的忠、孝、节乃是“以己属

① 《悼亡妻香祖诗二十首》,《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6页。

人的奴隶道德”，它使臣、子、妻成为君、父、夫的附属品而丧失独立自主的人格。正是它酿成了中国社会“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长虐幼”的种种惨剧，以致有人控诉旧礼教“吃人”。这就彻底否定了三纲以及由三纲所派生的忠、孝、节三德的神圣性、合道义性。随着道德革命和近代社会变革的步步深入，到辛亥革命时期，三纲业已权威不再，传统的忠、孝、节三德的合道义性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否定，不再将其视为崇高美德，逐渐丧失了对社会成员的规范和约束作用。

诚然，孔孟并未明言“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但是，他们视君、父、夫为尊，尊重和维护君权、父权、夫权的思想则是明显的。而且，《仪礼》明言：“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已明确将君、父、夫置于至尊地位。三纲的雏形是可以追溯到原始儒学的。到汉代三纲正式确立后，它一直是儒学的要义、宗旨。在此之后，历代儒家无不以维护和论证三纲的神圣永恒为己任，它是儒之所以为儒的标志。从宋代起，三纲又被理学家提升为“天理”，取得与天地并重的地位（即所谓“三纲之重等同天地”），被后儒视之为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天柱”、“地维”（曾国藩），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原本”（张之洞）。概言之，从宋代起，三纲在儒学体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近代的道德革命最终推翻了三纲，就使传统儒学的核心价值受到重创。由于三纲是传统儒学的核心价值，两者之间有着斩不断、无法摆脱的干系，因此，说传统儒学在近代的衰微与三纲的逐步解体同步，是不过分的。

在近代文化革新中受到质疑、否定的尚有传统儒家的公私观、义利观、理欲观。此外，诸如“天不变道亦不变”、敬天法祖、荣古贱今、用夏变夷、重德轻法、神道设教、崇本抑末、“学而优则仕”、士为四民之首等一套传统观念也在国人心目中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动摇。这样，传统儒学的价值体系、理论体系就被新学大潮冲击得越发支离破碎，失去昔日的光彩。于是，中国的价值取向不再以儒学为准则。如果说，废除科举、普及新式学堂、推翻帝制，使儒学接二连三地失去了制度的依托、支撑和保障，那么，从19世纪末兴起的文化革新、观念变革则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丧失了对传统儒学的信仰。从此，儒学不再能起到支配世道人心的作用。对

儒学的衰微、统治地位的丧失而言,这方面的影响更是致命的。

中国近代是社会变革、社会转型的时代,它必然又是文化革新、文化转型的时代。在强大的时代潮流的震荡、推动下,这两者不断相互推动、相互促进,使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发生急剧变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传统儒学不断受到冲击,因而不不断衰微乃是必然之势。

概言之,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宗族制的社会结构乃是传统儒学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母体。而到近代,中国历史既已发生历史转折,古老的中国社会业已艰难曲折地转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价值观念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传统儒学的主流、统治地位势必随之而终结。

## 第 一 章

# 清代(鸦片战争前):儒学的内讧与嬗变

在中国儒学发展、演变史上,清代是一个儒学自我清算、自我调整的时代。所以作清算调整,自然是为了使儒学拨正方向,获得生机,增强活力,更好地发挥儒学的社会功能。但是,到了清代中期,中国的封建社会业已由盛而衰,丧失活力,无可奈何地走上了下坡路。儒学赖以生存的社会母体既已步入黄昏期,儒学也就难以焕发生机,再现辉煌。而满洲贵族所奉行的文化专制、文化高压政策,又使清代的思想领域长期为文网束缚,难有自由。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人皆“避席畏闻文字狱”,以至于“万马齐喑”,儒学也难以创新。这种大形势、大环境就决定了清代儒学的自我清算、调整只是相互揭弊、彼此攻击,并未能实现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使儒学获得新的生机活力。于是,这种自我清算遂表现为同室操戈、相互指摘的内讧,弄得彼此皆一无是处、体无完肤;由内讧而内耗,反而削弱了自身的实力。可以说,儒学在近代的衰微,在鸦片战争前业已显露端倪。

### 一、程朱理学对陆王心学的攻击

在晚明,王学末流“不务格致,空谈良知”,“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以致有人放荡不羁、荒嬉纵恣,已经引起人们的不满,一些思想家业已发出纠王

学末流之弊的呼声。经由明末农民战争、李自成攻陷北京、清兵入关、明朝覆亡等大事变,在中国社会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大动乱重建社会秩序的时候,士大夫们势必循着欲求社会安定必醇风俗,欲醇风俗必正人心,欲正人心必明学术的传统思路作反思。在这一过程中,一批人将致乱之由归之于王学。于是,在清初出现了一股攻击王学的潮流,一时间王学成为众矢之的。

清初憎恶并攻击王学的人是相当广泛的。不仅有身居庙堂之上的“理学名臣”,也有长期居于乡里的理学家以及明朝遗老。他们的身份、地位、政治与学术倾向虽不相同,但都斥王学为“邪说”,甚至“冒阳明为贼”,是败坏孔子之道的罪人。冒王为“贼”,用语极重,可见他们对王学憎恶之深。

清初一些思想家所以如此憎王,是因为他们认为明末的战乱、明朝的灭亡是王学酿成的。顾炎武便将“王伯安(阳明)之良知”与“王夷甫(衍)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并列,指责阳明之学酿晚明之乱。<sup>①</sup>此后,这类言论甚多,如:

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故至于启、桢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sup>②</sup>

自阳明操戈树帜,为天下祸首,于是魁桀黠猾之士相助为波涛,而庸愚下士尽从风而靡,《五经》、《四书》悉更面目,纲常名教为之扫地矣……窃以为,阳明之祸天下,即怀山襄陵<sup>③</sup>未足为喻。<sup>④</sup>

阳明一出,而尽变天下之学术,尽坏天下之人心,率以酿乱亡之祸。<sup>⑤</sup>

① 参见顾炎武:《朱子晚年定论》,《日知录》卷十八。

② 陆陇其:《学术辨上》,《三鱼堂文集》卷二。

③ 《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意为洪水溢上山陵。此处是说王学之祸甚于远古洪水。

④ 张烈:《朱陆异同论》,《清儒学案》卷二十三《孜堂学案》。

⑤ 张烈:《读史质疑》,《清儒学案》卷二十三《孜堂学案》。